

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

陈国和

李遇春近年来一直从事20世纪旧体诗词的搜集、整理、评析、数据库建设等研究工作,为中国文学传统探幽发微、梳理文脉。同时,他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经典化上着力。《心证·史证·形证——中国当代小说经典二十家》就是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

在著作的引言“新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方法论”中,李遇春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甚至提升至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度。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宣言。从理论资源来说,新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方法体系既包括中国传统式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和“文史互证”之类的文论,也包括西方近现代丹纳的艺术哲学实证主义批评观,同时还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文学批评等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资源。

李遇春将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分为三个维度,即“史证”“心证”和“形证”。他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简称为“史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来揭示文学作品或作家的意义和价值;又将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心证”,偏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作家个人性或私人性的材料;而把与语言形式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形证”,旨在以文本为中心做形式逻辑分析,强调从文本内部来自我证明,带有逻辑实证意味。三个维度是紧密相依的整体,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每个维度适用空间相应地发生变化,同时又各有侧重。李遇春将这种文学批评活动称之为“新实证批评”。

显然,这种“三证合一”的新实证主义批评观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标新立异,而是充分吸纳了传统中国学术和现代西方学术中的相关理论,将中西、古今优秀文化资源融会贯通,并进行了富有时代性创新的成果。像其他批评家倡导的批评观一样,新实证批评说到底也是批评家精神世界的自我建构,是一种知识再生产。文学批评的学术实践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共同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景象,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心证·史证·形证》主要以改革开放以来的“50后”“60后”作家作品作为批评对象,同时兼顾乔叶、朱山坡等“70后”作家,这些选择折射了李遇春作为批评家的文学理想光芒。经过对20位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的精彩分析之后,在结语“实证与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中,李遇春从有效性角度再次总结“三证合一”的新实证主义批评观的理论体系。“三证合一”的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源于活灵活现的文学现场,萃取于批评家内在的思想积淀,透视了作家作品的精神力量,同时也彰显了批评家与历史和现实对话的勇气和抱负。

“史证”“心证”与“形证”相互渗透、彼此交融是新实证主义批评的理想境界。李遇春清晰地总结了新实证主义批评的路线图:第一步,批评家从“形证”出发,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发现文学作品的特殊形式;第二步,通过作品的特殊形式,批评家反观作家的思维方式,去解析作家的精神和心理特征,即把“形证”与“心证”结合起来;第三步在第一、二步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史证”,探究作品的形式特征或作家的精神、心理以及思维特征所形成的外在社会历史语境,由此可以透视出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精神风尚。通过这三个批评实践的步骤,达到“形证”“心证”与“史证”相互融合,从而形成理想的“实证”境界。

例如在探析路遥艺术踪迹的分析中,李遇春主要采取“心证”的方法,兼及“史证”“形证”等批评方法,系统分析路遥创作历程的嬗变。从创作心理角度来说,在创作《人生》的阶段,路遥主要表现了乡村青年在传统与现代冲突的两难中,不可避免需要面对的文化和生命焦虑。而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路遥的文化焦虑逐渐淡化甚至消解,而生命焦虑则有强化的趋势。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此时的路遥已经坚定了传统的道德主义立场。两位主人公分别代表儒家文化的不同向度:孙少安之于厚德载物、重土安居,孙少平之于自强不息、志在四方等等。而儒家这种文化伦理对生命个体的本能欲望与自由意志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这必然强化孙家兄弟内在的生命焦虑。他俩的奋斗

史、情感史就是一曲悲壮的生命之歌。为了精准分析文本,李遇春还将《平凡的世界》置于当时炙热的“寻根文化”潮流中进行系统观照,将《平凡的世界》和巴金的《家》进行对照阅读。他认为各种焦虑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也是理解小说世界的密码。路遥既有追求政治认同同时形成的政治焦虑,也有追求文化认同带来的文化焦虑以及伴随政治焦虑、文化焦虑而跌宕起伏的生命焦虑。三种不同的焦虑彼此转换、消长,显示了路遥小说创作的精神心理踪迹,彰显了《平凡的世界》文学图景的丰富与精妙。这种精彩的分析源于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恰如其分的运用。

由此可见,“三证合一”的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批评方法,为文本细读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李遇春追求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三位一体,将作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二者融合。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保持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锋芒,另一方面使当代文学批评具有文学史的视野。这种文学史视野是一种具有文学实感的视野——就是面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时候,批评者不是从古今中外的各种理论出发进行脚注式批评,而是以中国当代文学演变的历史视野来观照这些作

家作品,辨析这些作品的异质性和错位态,进行动态的历史分析,由此判定这些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或贡献。显然,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不是简单的理论阐释,而是有了客观的历史品格,也就是实证基础上的客观化阐释。

《心证·史证·形证》选择的20位经典作家为孙犁、茹志鹃、张贤亮、张一弓、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韩少功、莫言、姜天民、李锐、刘醒龙、邓一光、迟子建、苏童、格非、红柯、欧阳黔森、乔叶和朱山坡。这20位不同代际的作家的创作历程折射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光谱,他们的创作成果反映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灿烂业绩。这些极富个性的作家分析因此具有了文学史的艺术品格。而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时,出于鲜明的文学史意识、自觉的“三证合一”式的方法论追求,李遇春将精彩的文本分析与作家的创作史、当代文学文化史以及小说文体史紧紧结合在一起,使得《心证·史证·形证》既有精彩的文本细读,又有宏阔的理论概括,从而极大提升了著作的学术水准。

这本著作的主体内容基本上李遇春近些年的批评新作,就写作的温度而言,都比他以前的文章更有把控力。即便是每一章的标题也颇显雅致,文质兼美、意境深远,这也是其特别之处。



呼唤儿童文学新的精神

张锦江

儿童文学的创作题材,这些年许多出版社都在努力挖掘,特别是主题类作品,比如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红色经典绘本》一套10本,新蕾出版社的“中国女孩”系列图书,广东新世纪的《丝路大冒险系列》10册,中福会出版社“图画书月月看”“图画书月月学”系列,新疆少儿社的“小神兽”中国原创幻想系列,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赫哲族英雄传说故事》,湖南少儿社的湘江主题绘本丛书,浙江少儿社的红色主题读物,希望出版社的“希望书·成长”系列。这是当下儿童文学的一大进步。

但是,主题创作在发展中也有不平衡与不足之处,因作者写作水平、思想高低的不同,会使作品的品质不一。生活的储备不足,题材的雷同,老套路重复自己,眼界局限,当然不可能产生新颖独到的精品。今年年初我去北京拜访王蒙先生,讨论儿童文学的问题,他说

自己推崇宗璞的童话,认为那是文人童话,如《冰的画》《总鳍鱼的故事》等都有诗的意境,是在诗境中讲童话。想起王蒙自己的作品《无言的树》,一棵平常的树、不想言语的树,从来不参与任何纷争,只想安静地活着,结果还是被卷入是非之中,最后在电闪雷鸣中,它倒下了,但最终又在某一个春天发芽了。这同样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由此可见,题材的拓展依赖于作家的洞察力。

语言的个性化是作家成熟的标记,也是一个作家的终生追求。儿童文学中,有许多有语言个性的作家,我们一看文字就知道是谁的作品,如陈伯吹微笑的幽默、任溶溶的顽童口吻、含蓄的滑稽、任大霖的鲁迅风、洪汛涛的民间口语、郭风的诗话等。儿童文学语言的个性化是很难的一件事,我们要提倡新的语言风格,给孩子们阅读以语言上的享受。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艺术感觉杂说》,这篇文章是结合我的创作实践来说的,这种创作艺术感觉的触发,单纯来自生活的某种偶然性的激发,就像契诃夫说的“脑子里的发条就会忽然咋地一响,一篇小说就此准备好了”。在这当中“咋地一响”的“最高要素”不是故事,而是对真理的领悟。

对于儿童文学来说,给孩子的真理揭示自有它的特殊性,不是大声的喝斥,不是严肃的教训,不是空洞的道理。这种真理的敲响,应该像山涧的泉水叮咚,好似小草上晶莹的晨露,更像云雀的啼鸣。它是孩子心灵的渴求,精神的弦音。它应该与孩子的所思所想发生共鸣、交融,促使其沉思。当下的儿童主题书注重思想性、教育性,但在人生真理、人性真理的真诚、真实表达上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精辟的儿童文学真理一出现,

就会让孩子会心一笑,让他们看到万里晴空。一个好的故事,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都应有一个看似浅显但却充满人生启迪的道理做依托,像天边的一道光亮。

一个有理想、有作为、有责任感的作家,必定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必然每时每刻关注周围的人群,关注社会的变化,关注人们的命运。热情、真诚地拥抱生活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个作家如此生活,他自然会发现生活中的精彩无处不在,任何生活都可入诗入画入文。

对生活保有兴趣,以自己的眼睛观察人事万物,必然能写出好作品。安徒生可以写一滴水、一片叶子、一张纸、一颗珠子,留下无数的经典童话。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同样也可以循着这样的路径,将万物纳入自己的写作天地。因为在孩子的眼里,万物有灵。